

# 第一章 緒論

西元二〇〇〇年，在亞洲的台灣，五月二十日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台灣）總統；相同地，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十二月一日福克斯(Vicente Fox)就任墨西哥總統。台灣與墨西哥的在野黨都肩負打破該國長久以來一黨獨大威權執政的承諾，完成政黨輪替並逐漸步入民主國家的行列。<sup>1</sup>陳水扁所代表的民主進黨擊敗原執政之國民黨；福克斯所代表的「國家行動黨」(Partido Accion Nacional, National Action Party, 簡稱為 PAN) 則讓長久執政的「革命建制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簡稱為 PRI) 下台。<sup>2</sup>台灣與墨西哥透過選舉這個民主機制完成政黨輪替的政治工程，而政黨輪替是讓台灣與墨西哥正式邁入民主國家的重要里程碑。

就民主而言，選民自我治理是高於政府的一項自然權利，選民得以依其共同意志決定政府的統治行爲，甚至決定統治者。而定期性選舉就是落實自我治理精神不可或缺的活動，爲了避免政府腐敗或專制，選民選擇適當的反叛對民主而言是一件好事(Jefferson, 1977: 417)。

民主的方式是爲了達成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某些人藉由競逐人民選票而獲得決策權力(Schumpeter, 1976: 269)。選舉體現民主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制度安排，透過選舉選民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支持特定候選人，當候選人或政黨獲得

---

<sup>1</sup> 政黨輪替是政黨輪替執政的簡稱，也就是英文中所謂的 party alternation in power，指涉的是在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轉換由不同政黨掌握執政主導權的意思，意即政黨輪流執政(party rotation)。但政權轉移(regime transition)或政權替換(regime turnover)，指涉的範圍較大，是指國家機器和統治權力的移轉，其過程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其方式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威權的。政權交接可能發生在民主國家的政府之間，威權國家的政府之間，也可能發生在民主和威權體制之間的轉換。政權交接的順利與否，以及新舊政權在交接期間的作爲，不但關係國家的延續，也會影響政府的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效力(effectiveness)和效果(performance)，請見林佳龍，2000：2-5。

<sup>2</sup> 國家行動黨(鄧中堅，1996；蔡東杰，2002)的中文翻譯名稱並不一致，或稱全國行動黨；革命建制黨(鄧中堅，1996；蔡東杰，2002)的中文翻譯也有相同的狀況，或稱革命制度黨(何國世，2003)或制度革命黨(中華民國外交部，請見國情詳細內容：中南美洲地區\_墨西哥國)；民主革命黨(鄧中堅，1986；蔡東杰，2002)則較爲統一。

相對多數支持並取得執政地位，乃民主社會中選民決定執政者最高的目標。在選舉制度正常運作之下，選民的集體抉擇決定政黨執政權是否產生輪替的現象。無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在民主運作的常軌中，政黨輪替是正常的現象。例如：總統制的美國在一九九二年由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打敗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的總統老布希(George H.W. Bush)贏得總統選舉，完成政黨輪替；內閣制的英國在一九九七年由工黨(Labour Party)的布萊爾(Tony Blair)打敗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的首相梅傑(John Major)取得執政權並完成政黨輪替。在民主國家，政黨輪替是自然而平和的政權轉移(regime transition)。對執政者而言，是將政治理念付諸實踐的最佳良機；對人民而言，則是期望更換執政者以俾補既有政策之失，使人民從政府施政中獲得利益，或突破國家所面臨的困境。

過去在台灣與墨西哥威權體制下，通常是由最高領導人決定接班人，到了二〇〇〇年，才真正實現由選民透過合法且正當的程序決定領導人，達成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政黨輪替程序。<sup>3</sup>本論文的中心論點認為：經過多年民主選舉之後，必須從選民的角度出發，才能知道被統治者的思考依據為何？在何種考量下，長久居於威權統治且一黨獨大下之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會做出投票給在野黨的決定？是選民的政黨認同產生改變引發政黨重組，進而導致政黨支持群眾改變？還是選民深受候選人形象所吸引，選民支持群引發改變？抑或是因為選民受重要議題影響產生改變？上述因素都值得深入探討與分析。尤其台灣與墨西哥和平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其選民投票行為成因對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威權體制國家，在邁向民主鞏固過程深具啟發意義。

---

<sup>3</sup>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七年行憲之後的歷任總統，第一屆至第五屆為蔣介石，在一九七五年因蔣介石病逝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第五屆總統，第六屆至第七屆為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因蔣經國病逝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第七屆總統，之後並持續擔任第八屆總統，至第九屆總統選舉時，開始採用選民直選方式選出總統，李登輝取得連任，之後李登輝指定副總統連戰參與第十屆總統選舉，開啓真正的選舉競爭；另一方面，墨西哥選舉辦法規定，總統經由民選產生但不得連任，但革命建制黨政則存在由前任總統指定繼任者的慣例。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密集、頻繁的民主轉型後，新興民主國家 (nascent democracies) 的民主體制將會邁向鞏固、崩潰還是垮台呢 (Linz and Stepan, 1989)？眾多威權體制國家在短短數年之間，相繼走上民主之路，反對陣營甚至取得執政權且完成政黨輪替。<sup>4</sup>新興民主國家中，威權政體下的台灣與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未遭遇強大舊有勢力反撲之方式完成政黨輪替工程，凸顯台灣與墨西哥是民主轉型中政黨輪替的成功案例。就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而言，兩國選民投票決定政黨輪替的特色值得特別注意，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民投票決定政黨輪替，讓兩國政府在政黨輪替前後本身的政治情況，呈現出和平穩定的狀態；其次，相較於非威權體制國家（如日本），兩國在威權統治之下，政黨輪替的時間相對較晚；最後，與開發中國家（如泰國或菲律賓）選舉過程經常發生血腥對抗，兩國的政府與民間社會，在政黨輪替的爭議相對較少。以下就兩國同時發生政黨輪替的特質說明如下：

### 一、轉換政黨執政過程整體社會秩序穩定

政黨輪替前的台灣與墨西哥，民主轉型分別由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所主導，在面對府會一致的中央行政體制，政黨體系雖屬一黨威權獨大的政黨體系，但行政與立法能夠充分溝通與協調，相對於其他開發中國家政權移轉過程，常發生取得政權之執政者對反對勢力進行零和整肅。台灣與墨西哥政治菁英在引導漸進式改革模式上，雖然遭遇困境，卻也能因勢利導緩和尖銳對立的情勢，使得台墨兩國呈現政治穩定性高且整體社會秩序和平穩定的局面（田弘茂，1997；Chand, 2001）。<sup>5</sup>

---

<sup>4</sup> 在邁向民主轉型的關鍵點上，具有少數統治特質的威權政體本身經常衍生出溫和派與強硬派兩種不同選擇；溫和派因為體認到社會改革的壓力，且瞭解到若不進行改革將會失去既得利益，選擇主動採取民主化；強硬派則為保護既得利益而漠視社會改革的需求，請見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lippe Schmitter, 1986。

<sup>5</sup> 值得注意的是政黨輪替前的主政者都是技術官僚出身，在墨西哥如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在憲政制度上，屬「半總統制」的台灣與屬於總統制的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同樣面對多黨制與府會分立的政治情勢，雖都曾發生政治僵局，但墨西哥在總統制下行政權責分明，總統在府會分立與多黨政治的情況下依舊能夠主導政局（Weldon, 1997）。<sup>6</sup>台灣則因總統與實際接受國會監督的行政院長產生行政權歸屬爭議，期間雖發生衝突，但政治情勢並未惡化至發生彈劾或罷免等紊亂的局面。由此可知，台灣與墨西哥在政黨輪替前後這段期間，民主政治的發展相當平穩，雖然在政黨輪替後初期都發生零星抗爭，但抗爭平靜之後，台、墨兩國社會、政治秩序仍居於和平穩定。

## 二、終結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經驗

台灣與墨西哥皆於一九五〇年代萌生現代社會的公民選舉，如台灣在一九五〇年，開放地方選舉正式步入人民選舉的民主經驗；另一方面，墨西哥在一九四六年，革命建制黨完成改組，正式走向開放選舉之路。但相同的是，台灣的國民黨與墨西哥的革命建制黨，這兩個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政權，都透過嚴密的手段操控選舉。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之後，台灣遭逢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政治外交困境，墨西哥則遭遇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外債危機，兩國執政黨為了安撫民心，遂進行一連串黨內改革與執政策略調整。

台墨兩國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得以維持之主因，從相關的文獻歸納有三：一是經濟發展穩健，讓台灣社會與政治快速變化的情況下，因經濟持續繁榮而強化國民黨持續執政（田弘茂，1997：272）；相同地，一九八〇年代的外債危機，一九九四年的披索危機，

---

以及之後塞迪歐(Ernesto Zedillo)，在台灣如李登輝，這些主政者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具有民主素養，這對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過程中都是相當重要的因數。請見鄧中堅，2003：271-276，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273-276。

<sup>6</sup>在憲政體制的歸類上，根據 Duverger 對「半總統制」的原始定義，半總統制三項主要特徵：一、共和國的總統由普選產生；二、總統擁有相當的權力；三、除總統外，行政部門還存在內閣總理和各部會首長，且只要國會不表反對，就得以持續行使行政權（Duverger, 1980）。筆者依循上述定義認為台灣屬於半總統制。

墨西哥執政者採取適當的措施進行補救，讓經濟免於崩潰（Magaloni, 1999: 25）。二是派系政治的強大網絡穩固選民支持，在台灣利用派系所建構的強大政黨網絡勢力（田弘茂，1997：273）；在墨西哥利用統合主義(corporatism)下的網絡，透過統合主義的協助，連接政黨、派系及統合單位，延緩政權生命（Magaloni, 1999: 25）。<sup>7</sup>三是民眾對反對黨無執政經驗且能否解決政府危機仍有疑慮，在台灣反對黨缺乏執政經驗下，在墨西哥，民眾則因懷疑反對黨能否提出有效解決經濟危機方案下，都相對影響民眾轉換執政黨的意願（Magaloni, 1999: 25）。

在威權統治的氛圍下，台灣的國民黨更強調本土化與政黨財源交互運用的功效。就本土化而言，強調本土化與台灣化，逐漸改變外來政權的既有印象；就國民黨自主財源而言，是國民黨擁有龐大的黨營事業，使國民黨得以透過金權政治籠絡政治人物，並凝聚政黨團結的力量（田弘茂，1997：272-276）。

綜上所述，台灣與墨西哥執政黨透過內部改革壓抑追求民主改革的聲音，相對延長威權政體執政時間。在一九九〇年代民主化前後，<sup>8</sup>兩國執政黨控制選舉競爭程度保有執政優勢，且在自由化的選舉中，均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得票率。甚至在二〇〇〇年以前維持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稱「選舉的民主」階段，顯示自由選舉在民主化之後，雖已對國民黨或革命建制黨產生嚴厲的挑戰，卻未摧毀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的執政地

---

<sup>7</sup> 臺灣常見的派系係屬侍從主義(Clientelism)，主要是威權統治者透過資源配置所建立的交換關係（王震寰，1996）；墨西哥的統合主義，威權統治者透過法令規範工會、單一壟斷組織、層級組織等控制原則，控制政黨、派系及統合單位之資源配置與組織運作（Magaloni, 1999）。

<sup>8</sup> 1986年8月，革命建制黨中以 Cuauhtémoc Cárdenas 為首的重要左翼黨員，組成了「民主潮流」(Corriente Democrática, Democratic Current, 簡稱為 CD)，此一黨內政團聚集黨內對經濟政策不滿的民族主義人士及呼籲擴大黨內參與提名工作的改革派人士。一九八七年七月，革命建制黨撤回對民主潮流的承認。因此民主潮流許多成員退出執政的革命建制黨，並與其他小黨合組成「國家民主陣線」(Frente Democrático Nacional,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簡稱為 FDN)，並由 Cárdenas 代表國家民主陣線參與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對執政的革命建制黨產生明顯的威脅。雖然此次選舉最後敗選，但在敗選後，國家民主陣線及其他小黨重新組成左派重要政黨民主革命黨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 Democratic Revolution Party, 簡稱為 PRD)。

位，相對降低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可能性。<sup>9</sup>

### 三、政黨輪替邁向民主鞏固

台灣與墨西哥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就民主鞏固的角度觀察，在憲政制度上，兩國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都已承認政黨輪替的事實；在態度上，兩國多數政治人物與民眾抱持對政黨輪替事實雖不滿意但已能接受的態度；在行為上，兩國多數民眾相對肯定換黨執政，並未發生暴力革命或政變行為。由此可知，兩國民眾實已接受政黨輪替的結果。

一九八〇年代，相較於其他威權政黨，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因長期執政，除掌控各式行政資源，更因能控制民主化的進程，使兩黨在漸進的民主轉型中，維持既有優勢的統治地位。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兩國一黨獨大的執政黨，一方面藉由派系與統合主義方式進行利益交換，另一方面，調整政黨政治光譜逐漸往中間靠攏，進而確保中央執政優勢與國會過半席次（Levy and Bruhn with Zebadua, 2001: 112；田弘茂，1997）。直到二〇〇〇年，才因政黨輪替正式打破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的行政與立法優勢。對於選民抉擇造成的政黨輪替現象，影響兩國選民抉擇背後的成因，實值吾人得進一步的探討。

從選民抉擇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台灣與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發生政黨輪替的主因可能有三：首先，政黨重組導致不同政黨因為社會分歧與社會經濟立場差異，重新切割台灣與墨西哥的政黨體系，進而改變原本一黨獨大的政黨勢力分布；其次，反對黨不斷崛起的政治領袖，清新形象除吸引眾多新選民支持外，甚至改變舊有選民選擇支持非認同政黨之候選人引發政黨輪替；第三，重大議題中，以經濟表現之評價最為重要，若選民認為執政黨經濟施政表現不佳，會選擇懲罰執政黨，甚至期望在野黨取得執政藉以提

---

<sup>9</sup>依照 Huntington 所謂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起源於一九七四年葡萄牙，當時「選舉的民主」國家總共有 39 個，佔全球 142 個國家中的 27.5%，在一九九〇年，「選舉的民主」國家增加到 76 個，佔全球 165 個國家中的 46.1%，二〇〇〇年，「選舉的民主」國家快速增加到 120 個，佔全球 192 個國家中的 62.5%（Diamond, 2000; Freedom House, 2000、2001）。

供優良的經濟表現，並完成黨輪替的結果。

在探討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主因時，依照過去的選民行為研究，筆者選擇聚焦於密西根模型(Michigan Model)中，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三個主要變數：政黨重組、短期因素（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經濟評價是其中之一），藉以釐清影響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投票行為抉擇主因為何？進而分析、比較台灣與墨西哥為何產生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的結果？

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中，選民政黨認同改變所導致的政黨重組、選民心中候選人評價優劣及選民重大議題偏好等變數，是否會造成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結果？本文主要討論的重點有四：

- （一）政黨輪替是否來自選民政黨認同顯著改變所導致的政黨重組？在政黨輪替前，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是否曾發生顯著的政黨認同改變？
- （二）政黨輪替是否來自選民受候選人評價吸引所導致的現象？台灣與墨西哥，多數選民對在野黨總統候選人評價是否相對較佳，因而支持在野黨，進而造成政黨輪替？
- （三）政黨輪替是否來自選民受重大議題影響其投票意向所引發的結果？台灣與墨西哥選民在重大議題上是否相對偏好在野黨的主張，進而支持在野黨並造成政黨輪替？
- （四）上述這些因素，在台灣和墨西哥的政黨輪替中，有什麼相似與相異之處？

## 第二節 文獻檢閱

選民進行投票抉擇，其思考邏輯與決定依據為何？民主社會之選民與威權政體民主轉型後的選民，在進行投票抉擇時，是否採取相同的判準？在非民主國家，選民大多未具有決定執政者誰屬的權利，若具有這種權利亦可能僅具表象意義。但在民主轉型後的社會，尤其是威權體制民主轉型後的台灣與墨西哥，執政者為持續執政即非考量民意不可。換言之，何種態度或行為模式促成選民以手中所握有的選票決定換黨執政，即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焦點。以下就選民抉擇促成政黨輪替的相關研究與文獻，試說明如下：

### 一、政黨重組造成輪替

自從《選民抉擇》（*The Voter Decides*, 1954）及「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 1960》二書出版之後，政黨認同就成為研究影響選民投票行為必定會考量的關鍵變數。依照坎貝爾(Angus Campbell)等人對政黨認同的定義，其為一種心理的認同，指涉個人身處之環境，對某一個政黨的一種長期(long-term)的情感取向(Campbell et al., 1960, chap. 6; Miller, 1991: 557-568)。此種對政黨的歸屬感與忠誠感，經由社會化的過程，都呈現持續穩定的狀態，隨著成長歷程與多數投票給同一政黨的經驗積累，而增強這種黨派的心理認同感。政黨認同主要包含兩個面向：「情感」(affective)與「行為」(behavior)。情感面指涉是不管選民個人過去的投票行為，選民自行認定對某一個政黨認同感的強弱程度，此乃政黨認同的核心概念；就行為面而言，政黨認同這種長期性情感取向會由內而外的影響選民之政治態度，並外化為投票抉擇的參考依據。因此當選民自述愈認同一個政黨，即可知他對這個政黨具有「歸屬感」(attachment)，通常被視為「黨性」(partisanship)。黨性是一種類似「超態度」(super attitude)，它是個人信仰系統的起點，並具有極大的啓發作用，因為它能提供選民評價新政治資訊的參考架構，以作為投票抉擇的依據，由此可知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多數



會被理解為經常投票給相同的政黨，可稱為黨性的指標。個人與政黨之間的連結是建立於心理層面，並不需要一定是黨員、準時繳黨費，或投票記錄才算，即使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還是可以自認為是共和黨人(Miller and Shanks, 1996: 120)。因此，政黨認同已成為瞭解民眾投票行為的重要關鍵因素。

政黨認同對美國選民投票的影響力非常明顯。在其他民主國家的研究也發現，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同樣具有明顯的影響力。然研究者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在多黨制國家難以找到與政黨認同概念相同的測量工具，或者選民對於黨性概念具有不同的定義(Budge, Crewe, and Farlie, 1976)。儘管政黨認同的測量爭議頗多，多數研究者仍然同意多黨制國家中，選民會對政黨具有忠誠感且會長期持續並強烈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兩國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同處於多黨制的型態，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化是影響此次大選的主因之一。<sup>10</sup>

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的成因，首先是政黨重組：因政黨重組造成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動，其反應的是選民投票時所依賴的政黨認同基礎分佈發生變化。其次是短期因素影響：假設在政黨認同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可能的短期因素包括：總統候選人的能力與人格特質評價、經濟表現的評價，以及競選策略操作...等，此等因素都可能造成選民對候選人凌駕政黨認同，導致選民政黨投票對象發生改變，但在下一次的選舉中，選民將會恢復正常且投票給其認同政黨的候選人。以下就造成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的成因進行討論：

關於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的第一種解釋，與選民的政黨重組有關，至於何種原因導致

---

<sup>10</sup> 台灣與墨西哥政治學界的選舉研究中，在二〇〇〇年以前因為兩國都面臨一黨獨大的情況，選民面對競爭有限的選舉，是否會形成類似美國選民所定義的政黨認同頗多質疑。在實證中可以發現，臺灣選民對政黨的「偏好」、「支持」或「認同」與其投票行為都呈現顯著相關（劉義周，1997；陳陸輝，2000）；墨西哥選民對政黨的「偏好」、「支持」或「認同」則與意識型態及投票行為呈現顯著相關（Domínguez and McCann, 1995；Moreno, 2003）。

政黨重組呢？歸結過去研究發現，主要聚焦於新政治世代加入、既有政黨認同的解組、國內發生重大事件、新社會分歧線產生與新議題的產生……等。試分述如下：

### （一）新的政治世代加入

所謂的「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依布朗嘉氏(Richard Braungart and Margaret Braungart, 1989)的說法：一個世代意識到本身獨特的社會與心理經驗，認知自身存有一套特殊的政治態度與判斷基礎，且能針對外在政治改變而調整本身的目標與行動，就稱為政治世代(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9: 285)。新的政治世代經歷不同的時空環境，對其政治態度、價值及傾向，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美國城市的暴動、人權示威、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與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被刺殺、越戰(Vietnam War)與尼克森(Richard Nixon)水門醜聞案(Watergate Scandal)……等，皆不斷刺激新的政治世代對政黨產生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受到新的思潮與資訊的影響後，新的政治世代對於舊有政黨並無深層依附的情感，亦無堅定的政黨認同，導致其政黨認同較弱，整體政黨認同分佈發生變動的情況也較為明顯 (Miller, 1992: 1-42)。

此外，世代間(intergenerational)的政黨認同亦有差異。早期的研究發現，年長者（舊的政治世代）的政黨認同程度較強且穩定。一九六〇及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生長的新政治世代，受越戰及學生運動風潮的影響，相對而言政黨認同強度大為降低，獨立選民相對增加；同一時間內的代間政黨認同，也會隨著議題不同而產生差異，特別是較「難」（需要較多政治知識來瞭解或判斷）的議題，代間的差異性更加明顯(Maddox and Nimmo, 1981: 401-408)。在世代交替的情況下，有較強政黨認同的選民，逐漸為政黨認同較弱的選民所取代，政黨支持者的人口結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政治世代就成為解釋政黨認同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新政治世代汰換的影響下，加速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導致政黨重組的情形不斷增加 (Miller, 1992: 1-42)。

台灣雖然政黨認同測量的方法或有差異，但在使用政黨偏好的概念時，發現新的政治世代加入社會之後，在年齡結構上有日趨年輕化的分佈，這一群新世代的選民，在政治取向上跟舊世代選民並不一致，若年輕世代選民隨著年齡增加仍維持相同的政治態度，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在政黨體系形成後的第二至第三代內穩定下來，將會影響選民的政黨重組（劉義周，1994：53-54；Abramson, 1976: 469-478）。另一方面，墨西哥具有類似的情況，新的政治世代加入社會之後，年輕世代的生活背景與社會關係，造成年輕世代選民的政治取向異於年老世代的選民，間接影響選民的政黨重組(Klesner, 1994: 137-149)。

## （二）選民改變政黨認同與新選民的動員

政黨支持基礎發生改變亦是政黨重組的原因之一，亦即選民轉變其所支持的政黨。政黨認同穩定國家之選民，具有長期穩定的心理取向特質，不易形成政黨重組的現象。選後，即使原居多數的政黨再次獲勝，支持該政黨的選民社會基礎若已發生改變，並產生一個新的政黨均衡，即是「政黨重組」，但這種情形發生的可能性較少。較有可能的原因是新世代選民的加入，因新世代選民與舊世代選民的政黨認同方向與強度不一，可能影響政黨之間勢力的消長，進而引發政黨勢力重組。「政黨重組」的前期會發生「政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現象，選民在此時逐漸對原有政黨認同發生鬆動或對原認同政黨失去向心力。選民的認同在新舊政黨之間流動，並呈現小幅度的重組情況。政黨認同發生鬆動或對原認同政黨失去向心力，是否增加造成政黨重組的可能性，亟待檢驗。真正的政黨重組必須待「關鍵性選舉」(critical election)發生後，選民的政黨認同便會重新確立，新的政黨體系方能確定(Sunquist, 1983)。

奈伊(Norman Nie)、蒙巴(Sidney Verba)及派翠克(John Petroick)研究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變化情形發現，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強政黨認同者(strong partisans)、弱政黨認同者(weak partisans)、獨立選民(independents)的比例穩定，但一九六四年後堅強政黨認

同者減少，獨立候選人比例增加，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的比例相對增加(Nie, Verba and Petroick, 1976; Wattenberg, 1990)。部分自稱為獨立選民的高知識份子擁有良好的政治資訊，但其政治偏向仍偏好某個特定的政黨，且有可能比弱政黨認同的選民擁有更強的政黨情感。其依照政黨取向投票的情況，甚至比弱政黨認同的選民更加穩定。故政黨認同式微或獨立選民增加造成政黨重組的可能性，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台灣與墨西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威權體制下一黨獨大的情況逐漸鬆動，在多數情況下，選舉結果仍由國民黨與革命建制黨獲得勝利。在都市化與教育程度提升，反對執政黨的聲音屢屢出現。尤其都市化程度高、教育程度高的居民，產生政黨重組的現象，新選民的加入也讓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改變(Klesner, 1993: 189-190)。

### (三) 國內發生重大事件

當國家面臨政治、經濟重大危機或特殊爭議議題時，都是造成政黨重組的原因。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就是最好的例子，經濟不景氣導致選民政治信任感降低，也讓選民開始質疑政府領導人的能力。此外，一九七〇年代的越戰與水門事件也導致選民對共和黨失去信心，並質疑政府是否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否則怎麼會將自己的子民送往戰場。政府處理重大危機若依循地理區域、年齡或階級分隔線，將很容易激化政治往兩極發展，使得民眾政黨認同產生轉變，進而導致政黨體系的重組(Campbell et al., 1960: 421-422; Wattenberg, 1998)。

台灣政黨認同分佈被視為是長期穩定，且多數選民認為政黨認同是一輩子的承諾，個別選民很難從某一個政黨認同跨越到另一種認同，就個人層次而言，政黨認同相對穩定。過去的研究發現，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變動時，造成全國性的變遷，相對啟動政黨重組(陳陸輝，2000：130-131)。一九八二年墨西哥外債危機後，因重建需要迫使執政者由經濟民族主義轉而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擴大並落實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政

策。此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議題主張，於一九八七年讓部分革命建制黨支持者選擇脫離革命建制黨，轉而支持卡德納斯(Cuauhtémoc Cardenas)所代表的民主革命黨，造就政黨重組的局面(Klesner, 2004: 91-122)。

#### (四) 新社會分歧產生

政黨在歷次選舉中，通常會維持一貫的理想與主張，其反映政黨的歷史根源，或社會利益連結方式及意識型態。李賽特(Seymour Lipset)及羅肯(Stein Rokkan)描述現代政黨體系的發展，指出現代政黨體系是由於國家與社會經濟發展下的產物。當代的政治分歧反映出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兩次革命成功的結果。兩位研究者在建立有關社會分歧與政黨體系之間歷史連結的分析架構時，認為分歧會導致不同階級利益的對立，使得一些以階級為主的政黨相繼出現。如英國「工黨」與美國「共和黨」(Lipset and Rokkan, 1967: 15-23)。

台灣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選民的政黨認同主要是受「省籍分歧」所影響，政黨認同與省籍之間具有高度相關(劉義周, 1994)。一九九〇年之後，台灣經濟發展趨緩，且貧富不均的狀況日益惡化；相同地，墨西哥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外債危機與一九九四年的披索危機後，造成家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兩國先後發生經濟狀況日趨惡化、個人經濟無法改善的情況，導致中產階級不斷消失，「貧富分歧」這個新社會分歧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情況益發明顯。

#### (五) 新議題產生

政黨重組會與新議題產生密切相關，乃因部分過去「活動力不足」(inactive)選民，因關注新興議題而受到動員的結果。例如反核、反污染、地球暖化等等地方環保議題，使德國原本各自獨立的環保團體，因新興的環保議題在環境保護意識與反核立場之下共同攜手合作，且有感於體制外抗爭或區域性零星抗爭無法發揮立即而明顯的作用，最後

選擇組成有形的政黨組織並大力宣揚環保意識。從體制外的抗爭、地區性的抗爭，走向體制內立法妥協及全國性反對運動，透過合法的宣傳管道喚起民眾的環保意識。使得新興議題吸引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同時造成部分選民拋棄既有的政黨認同轉而支持綠黨並引發政黨重組，故新興議題有可能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且導致政黨重組。

綜合言之，隨著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台灣與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變動，尤其當政黨成員轉換(*switching*)或改變(*changing*)讓大量選民轉移認同，甚至過去有權卻從未投票的選民，以及首次具有投票權的新選民，再則是無法活動或不想活動的不活動(*inactivity*)選民，都發生選民成員改變、被動員或停滯(*demobilization*)的現象。換言之，選民改變自己原有的習慣而去投票、改投票或不投票，都是影響政黨重組的原因(Petroick, 1981: 31-33)。當政黨重組頻繁、新世代選民加入、資訊管道多元化……等，皆會造成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某種程度的消長。政黨認同的消長將明顯影響選舉的結果，尤其當台灣與墨西哥出現「關鍵性選舉」之後，就有可能讓原本執政的多數黨因政黨認同的消長，在總統大選中失去既有選民支持，導致政黨輪替的現象(Key, 1955)。

## 二、短期因素造成政黨輪替：候選人評價

候選人形象對於選民投票行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早期的研究中，候選人形象並不受重視，邇來卻成為美國投票研究領域中躍居領先地位的主題(Niemi and Weisberg, 1993: 138-146)。在《美國選民》一書中，候選人形象更被認為是影響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勝選的關鍵因素(Campbell et al., 1960: 450-451)。史透克斯(Donald Stokes)更強調候選人形象是常態投票(*normal vote*)偏離的主要原因(Stokes, 1966: 27)。受候選人形象影響而投的票，被視為是受候選人個人特質所吸引，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進行評價並決定其投票意向。為擴大候選人因素的範圍，本文有關候選人因素的部分，將以「候選人評價」取代所有選民對候選人人格特質、能力與感覺的評價。

當選民對候選人進行評價時，選民考量主要依據三類指標：一是候選人人格特質，二是候選人能力，三是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米勒(Arthur Miller)、華特柏格(Martin Wattenberg)與馬蘭奇克(Osaka Malanchuk)發現，選民對候選人的人格特質評價相當穩定，教育程度是選民傾向關心的特質(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 521-540)。他們更進一步運用基模(schema)來評價候選人，基模是一種知識結構且發現選民常利用基模進行候選人的分類，這種心理歷程將降低認知能力到可管理的範圍。其次，他們將選民評斷候選人特質的相關面向歸結為：能力(competence)、可信賴度(reliability)與人品(integrity)；肯德(Donald Kinder)運用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簡稱為NES)的調查資料，使用因素分析建構出四個候選人認知的核心標準：能力、領導能力(leadership)、人品與同情心(empathy)。他們發現這些標準會讓選民心中總統候選人的印象更加凸顯，候選人評價(人格特質與能力)這個變數的短期因素特性由此可知(Kinder, 1986: 255-263)。

選民如何認知候選人的人格特質與能力評價或甚至感覺候選人呢？是經由長期累積的資訊得知，還是藉由特有的「捷徑」(shortcut)對候選人進行短期評價呢？蘭德(Wendy Rahn)在其資訊處理過程模型中，認為一般人在面對大量資訊時，會透過分類策略進行快速擷取與處理，並儲存於選民的記憶中。當民眾心中存在這種觀感與記憶時，將會影響或左右個人資訊處理過程，即「強化一致的資訊、剔除矛盾的資訊，且將既有的資訊內化成政治資訊」(Rahn, 1993: 475-489)。蘭德亦指出，候選人評價具有「即時」(on-line)性特質，即選民會利用對候選人人格特質與能力進行短期評價，羅吉(Milton Lodge)也認為，選民會具體化且隨時更新自己對候選人的評價，選民會從各種競選活動中獲得之新資訊不斷更新候選人評價，藉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回應(Rahn et al., 1994; Lodge et al., 1995)。

在台灣選舉研究中，已肯定候選人評價是影響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陳世敏, 1992；

梁世武，1994；胡佛、游盈隆，1983；金溥聰，1997），且候選人評價因素中，主要參考候選人的能力、人品、信賴度與領袖氣質（傅明穎，1998）。選民在「選人不選黨」的情況下，候選人形象相對較佳的候選人較容易贏得選舉，並造成縣市長輪替執政（陳義彥，1994）。在墨西哥過去的研究中，也強調候選人形象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發現影響候選人評價主要是能力、領導能力、人品與同情心，調查要求受訪者從競爭者中，挑選能力較佳、人品較好、最有領導特質、具有同情心與親和力的候選人（Dominguez and McCann, 1995,1996; Poire, 1999）。

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包含的內容較為多元，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與投票抉擇之間更有高度相關，因此常常作為投票預測的重要指標（盛治仁，2000），但因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是依附在候選人個人身上，仍舊有濃濃的候選人因素，故本文會將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當作候選人評價的一環，但在進行模型分析時，將避免與其他候選人評價放入模型一起分析，以免發生共線性的情形。

筆者將以候選人人格特質、候選人能力、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作為候選人評價分析的基礎，評估台灣與墨西哥三位總統候選人之間的差異，並找出候選人形象最佳者。候選人評價是一種短期的影響因素，會改變原有的常態投票，短期因素來自選民即時更新候選人的記憶，故當選民對所有候選人評價加以排序時，選民就會打破常態投票的行為，轉而投票給形象最佳的總統候選人並造成政黨輪替。

### 三、重大議題造成政黨輪替

議題因素是否會讓選民的投票對象發生改變呢？菲奧瑞納(Morris Fiorina)從理性抉擇的觀點出發，他認為選民會因對現任官員、領袖或其他議題的回顧評價，而持續影響自身的政黨認同，甚至其投票抉擇。其研究集中在候選人所倡導的議題，無關候選人特



質，故無論候選人當選後是否依然堅持選前提倡的議題，候選人評價背後所代表的理性，是評價候選人在選後能否實現選前所提出的競選承諾(Fiorina, 1981)。<sup>11</sup>當選舉法規與競選環境讓選舉日趨公平且乾淨，且選民已逐漸習慣表達懲罰或獎勵現任者，議題中的經濟評價因素，能否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明顯影響力，值得吾人深入討論。首先，筆者將觀察選民是否認為經濟議題是國家當前最重要的議題；其次，再結合選民經濟評價進行連結。

影響選民投票的重大議題主要有二：一是經濟表現；二是其他重大議題。首先，相較於議題投票，「表現投票理論」(performance voting)乃是理性選擇學派分支，且主要以經濟表現為主，選民的投票行為是根據政府施政的經濟表現而定，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應選民對經濟情勢好壞的判斷，選民利用選票這種工具獎勵或懲罰在位執政者。表現投票理論又可依據選民對經濟條件評估的標的與時點，分成「荷包投票」(pocketbook voting)與「社會經濟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及回顧評價投票與「前瞻評估投票」(prospective voting)(Lewis-Beck, 1990; Kiewiet, 1983; Achen, 1992)。回顧經濟評價與前瞻經濟評價，這兩種經濟評價都可能造成政黨輪替的結果；其次，在重大議題方面，台灣與墨西哥有共同的議題，即二〇〇〇年一黨獨大的執政黨都遭遇重要改革議題；而相異的議題方面，台灣的黑金與兩岸關係及墨西哥的美墨關係各是兩國其他的重大議題，都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 (一) 經濟表現：執政黨經濟表現與施政表現或經濟展望

菲奧瑞納的回顧經濟評價理論對投票理論產生重要的影響，政黨認同不僅會影響重大議題及候選人評價；相反地，執政黨的施政表現與經濟回顧評價，也會反過來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即為政治心理學上所謂的「說服效應」(persuasion)。據此，

---

<sup>11</sup> 由於當斯(Anthony Downs)的空間理論或羅彬皓茲(George Rabinowitz)及麥當勞(Stuart MacDonald)的方向理論均以政策議題為主要考量，故稱之為「議題投票」。請參閱 Downs, 1957; Rabinowitz and MacDonald, 1989 等相關文章之討論。

選民投票模式理論應該被視為可回溯模式(recursive model)，透過回溯評價決定投票抉擇。另一方面，前瞻投票也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依據，艾肯(Chris Achen)認為選民對於國家未來的前途發展乃值基於前瞻評估，當選民考量本身利益並衡量政黨的未來作為，對國家未來情勢發展抱持正面樂觀態度時，將會傾向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在野勢力(Achen, 1992)。當經濟景氣不佳或是面臨衰退時，選民反而願意採取冒險的行為，將轉而選擇激進的在野黨，期待在野黨開創新局，希望在野黨給予明天美好的展望(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Patty, 2002)。候選人或現任者的經濟政策施政優劣，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所屬政黨經濟表現的評價，進而改變選民對政黨的經濟總評價，相對影響選民最後的投票抉擇。

台灣自從開放大規模選舉之後，經濟評價投票的影響力逐漸增加，且經濟評價投票已經被證實是投票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黃秀端，1994)。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對回溯評價投票雖有不同看法，但多數都同意選民傾向於對現任者的施政表現進行獎賞或懲罰，亦相信回顧評價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力(Buendia, 1996; Dominguez and McCann, 1996; Poire, 1999)。墨西哥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五年經濟危機之後，回顧投票的影響力逐漸增加，但一黨獨大的政黨體系與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政黨體系，選民的回顧評價有明顯的差異(Magaloni, 1999: 23)。由此可知，選民對現任執政者惡劣的經濟評價，與反對黨給予選民未來經濟表現的夢想藍圖，最終都可能產生政黨輪替。

## (二) 其他重大議題：黑金或改革議題、兩岸關係或美墨關係

在其他重大議題方面，改革議題是台灣與墨西哥威權政體所共同遭遇最大的議題，主要是處於長久一黨執政下，統治階層習慣壓抑反對的聲音，故兩國在二〇〇〇年選舉時，反對黨候選人都高舉改革大旗。在台灣，相對於改革議題，黑金問題也是國民黨常為台灣民眾詬病的問題；另外，台灣與大陸之間，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都相當密切，故兩岸的互動與政策議題亦會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抉擇，尤其一九九六年總統

大選時的飛彈危機及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六日朱鎔基的強烈聲明，讓兩岸關係所代表的統獨議題，也成為影響台灣民眾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盛杏媛，2002；劉義周，1998）。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移民、毒品與犯罪問題，美墨關係的議題會影響墨西哥選民的投票抉擇，當選民贊同「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則表示其贊同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民族主義經濟策略，也相對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Levy, Bruhn, and Zebadua, 2001; Rubio, 2004: 13-14)。

綜上所述，本文的假設命題是：台灣與墨西哥皆因政黨認同分佈改變所引發的政黨重組、短期因素的候選人評價及經濟評價與重大議題等因素，讓選民選擇投票給非執政黨且產生政黨輪替新局面。首先，當台灣與墨西哥大量選民認同轉變造成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變動，新世代選民加入的情況，選民改變既有的投票抉擇，都是影響政黨重組的原因。因此，選民若打破常態投票的行為，轉而投票給形象最佳的總統候選人，此種投票抉擇暫時偏離的短期因素是原因之一。最後，當重大議題對選民產生影響力後，選民透過經濟回顧與經濟展望持續不斷地更新態度與投票取向，所以菲奧瑞納認為當選民對在野黨回顧評價的「總數值」(running tally)或經濟展望的評估總值，相對高於既有執政黨者，選民就可能放棄執政黨候選人，轉而支持評價正面的在野黨候選人產生政黨輪替。<sup>12</sup>不可否認的，其他重大因素也是影響台灣與墨西哥選民做出政黨輪替選擇的結果，為利於比較，本文雖呈現台灣黑金議題，但深入分析比較時，僅就兩國顯著的改革議題進行討論。

---

<sup>12</sup> 菲奧瑞納的想法，後來為政治心理學者應用在資訊處理模型。舉例而言，即時資訊處理模型認為，人們一接受資訊以後就會評估，而這個評估的情感數值，會加進一個長期的評估加總數值(running evaluative tally)中，當人們需要做評估時，這個評估加總數值的結果，就會立刻從記憶中提取出來(Lodge and Stroh, 1993)。

### 第三節 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

#### 一、研究主題

在嘗試回答的問題中，筆者對解釋變項預設了因果順序，首先除了考慮政治社會行為的個人與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政治世代、教育程度與居住地區作為控制變項外，也將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及其他議題當作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投入模型進行初步的分析，之後再投入相關的政治因素。分別探討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重大議題及其他議題，對台灣與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選民投票的政黨抉擇的影響，進而評估產生政黨輪替的可能性。筆者擬在本論文中探討下列的問題：

- (一) 是否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台灣與墨西哥多數選民的政黨認同發生顯著改變的政黨重組現象，讓選民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時，會根據改變後的政黨認同，進行政黨抉擇投票行為，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自一九八〇年初期，除國民黨之外，所謂的黨外已經逐步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一九八七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台灣政黨體系進入實質的政黨競爭關係，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開始產生變化，自認具有民進黨政黨認同的民眾急遽增加。到一九九四年，由於國民黨分裂成國民黨與新黨兩股政治勢力，讓民進黨逐漸對國民黨產生威脅，甚至開啓是否產生政黨重組的討論；墨西哥自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就已經存在反對勢力，一九三九年即已成立的國家行動黨，雖然勢力不大，但存在反對黨的象徵意義。直至一九八七年之後，卡德納斯的勢力脫離革命建制黨另成立民主潮流(*Corriente Democrática or Democratic Current, CD*)，之後另結合眾多反對勢力成立國家民主陣線(*Frente Democrático Nacional or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FDN*)，且參與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若非執政黨運用非法手段，否則既有執政黨已經下台。敗選後的卡德納斯與國家民主陣線在一九八九年成立民主革命黨。由此可知，墨西哥政黨體系在一九八八年已

經成爲具有實質競爭的關係。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因爲短時間的政治效應，讓革命建制黨內部產生分裂，也衍生原執政黨與新興勢力政黨認同，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原因。而選民政黨認同改變，導致政黨勢力的消長。

政黨認同在解釋選民投票行爲，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且因其具有高度穩定性，一旦形成即隨著生命週期增加強度（Campbell et al., 1960；Abramson, 1983）。一般而言，選民的政黨認同並非恆久不變，一旦多數選民的政黨認同發生顯著改變，即可能引發政黨重組。台灣與墨西哥都發現政黨認同改變將會造成政黨重組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有意探詢，台灣與墨西哥是否會因選民政黨認同發生改變所形成的政黨重組，導致選民支持對象所屬政黨產生改變，進而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二）是否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台灣與墨西哥多數選民爲三位主要候選人形象吸引，讓選民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時，會因爲候選人因素投票給認爲形象最佳的候選人，而依照多數選民認爲形象最佳的候選人，其背後所代表的政黨若非舊有執政黨，將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選民投票行爲深受選民對候選人評價所影響，候選人評價因素屬於短期因素，當多數選民對在野黨總統候選人評價最佳，即會反應在其投票行爲。候選人評價包括選民對候選人的人格特質評價、候選人能力評價與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等三項，選民從各種選舉資訊當中依照選民自己的能力簡化或進行解讀，從而得到對總統候選人的三種評價分數。候選人格特質呈現在領導能力、品行道德、值得信賴、瞭解民衆需要、親和力等五個主要面向( 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候選人能力則以解決國家重大問題爲主，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與改革決心等層面；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則以情感親密度進行考量。

台灣與墨西哥選民的投票行為與其候選人評價息息相關，當多數選民因候選人評價選擇支持其認為相對較佳的人選時，因台灣與墨西哥選民對在野黨候選人的評價較佳，讓候選人評價因素會造成多數選民選擇支持在野黨，進而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三) 是否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台灣與墨西哥多數選民會考量經濟評價因素，或者考量重大議題因素。首先，讓選民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時，因為經濟前瞻評價或經濟回顧評價因素，拒絕投票給現有執政黨或投票給在野黨，是否將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其次，選民投票給議題主張與其最近的候選人，而依照多數選民認為議題主張最接近的候選人，其背後所代表的政黨若非舊有執政黨，是否將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學者透過經濟投票現象是研究選舉課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最好的方式，這個背景提供非常好的機會去研判混合的資訊、認知及歸因。<sup>13</sup>討論經濟投票的文獻眾多，分佈在政治學不同次領域，最著名的研究多在美國研究及比較研究。探討的問題仍然民眾面對經濟循環時，是否或如何對現任執政者進行課責，給予現任執政者獎勵並讓他繼續執政，抑或是懲罰現任執政者並政黨輪替。在美國的情境下，民眾會考慮全國性的經濟表現，當選民投票反對現有執政黨，則可稱之為「社會經濟投票假說」，而不是依賴「簡單理性」的個人荷包投票。有時候會有例外情形出現，尤其是透過橫斷性資料僅能提供單一時間點的資訊，並無法提供時序性資訊。某些作品中會呈現強烈的個人荷包投票現象，反而排除社會經濟投票的影響力(Nannestad and Paldam, 1997)，然而其他作品中卻發現經濟投票僅具些微影響力(Monroe and Erickson, 1986)。僅有少數學者為不同研究成果提供制度化的解釋方式，在所研究的不同國家中，他們傾向聚焦系統化差異（如：Powell and Whitten, 1993）。尚有一些學者建議在所研究的

---

<sup>13</sup>如果公民能夠辨別具代表性與無代表性的政府，且能夠應用懲罰機制，剔除那些表現不好的政府並保留表現優秀的政府，代表的就是政府具有被課責性。請見 Przeworski, Stokes and Manin, 1999 eds.,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這些國家中，個體層次的差異應該會產生不同經濟投票行為的效果 (Duch, 2001:895-910; Gomez and Wilson, 2001)。重要的是，這些學者幾乎都將民眾視為一個整體(monolithic)，假設或甚至毫不懷疑地認為所有個人特質與責任都會呈現相同的型態。從簡單的證據與結果顯示：深思熟慮的民眾或多或少會追究在位者的經濟表現。

另一方面，在重大議題方面，當選民受顯著議題所吸引，例如：改革議題，選民就會依照議題偏好進行抉擇，政黨會提出能夠吸引選民支持的議題。若選民依照議題進行投票抉擇，當對在野黨之議題偏好多於執政黨，即會因為多數選民議題偏好改變轉向支持在野黨，進而選民支持在野黨的比例相對高於原有執政黨，導致既有執政黨下台的政黨輪替現象。

(四) 上述這些因素，在台灣和墨西哥的政黨輪替中，相對的重要性各如何？

經由投入政黨認同重組、候選人評價因素、議題因素等三個主要變項，深入探討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影響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並比較三種主要變數相對重要性。

## 二、研究架構

從過去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議題因素，是影響選擇政黨輪替的主要因素，故在研究台灣與墨西哥的選民行為時，筆者也希望借用過去的研究成果進行討論，在研究架構圖中，研究的變項有三：一是政黨重組，代表的是，當政黨分佈發生改變時，就意謂著政黨發生重組的現象；二是候選人因素，代表的是，當選民對在野黨候選人的人格特質與能力給予最佳的評價，或者對反對黨候選人的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最高分時，意味著候選人評價這個短期因素，讓選民選擇支持評價最

佳的在野黨候選人；三是經濟評價議題及重大議題因素，當執政黨無法改善現有經濟狀況，甚至是期待在野黨執政後能帶來煥然一新的經濟表現，則選民可能轉而支持在野黨。並以人口學變項：包括年齡、政治世代、教育程度與居住地區作為控制變項。因此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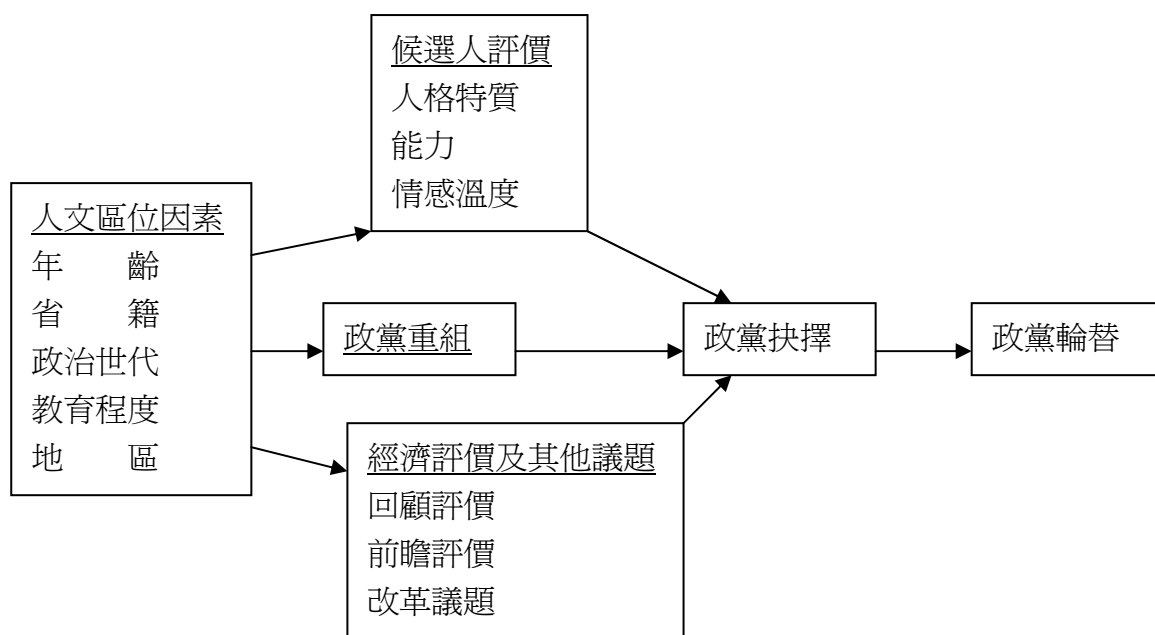


圖 1 -3 研究架構圖

在探討影響台灣選民與墨西哥選民因為何種重要變數的影響，導致選民選擇投票給非執政黨，讓在野黨上台以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本文擬先由研究假設創造自變數，之後透過交叉分析，觀察各自變項對依變項之間的關連性後，再針對重要且顯著之因素進行分析。因為考慮到依變數是屬類別變項，故本論文將引借「機率論」(probability)的觀點，導入決定事件發生機率之機制作為本文的研究重點：如本文依變項為政黨抉擇，在主要三個總統候選人所代表政黨當中，選民決定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連戰相對於選民決定投票給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其發生機率受哪些因素所影響？



本文的依變數分析，以選民的「政黨抉擇」為主，其測量層級乃是屬於「無序多分」(polytomous)的變數，所以本文設定「多項勝算對數」(multinomial logit, MNL)進行深入分析，以釐清不同投票對象與自變數之關係有無顯著之影響，並藉以探討影響選民決定投票給在野黨的主要原因。

就依變數的操作上，有關總統、副總統競選組合的表達，將以政黨方式呈現，僅分析國民黨、民進黨及宋楚瑜（親民黨）等主要三黨或政治勢力，一方面是投給其他政黨的樣本數並不多，例如：新黨的李敖及無黨籍的許信良，如果放入新黨對抗國民黨的模型，將會增加統計上的估計值，相對侷限操作變數的便利性與合理性(Aldrich and Nelson, 1984: 73)。<sup>14</sup>另一方面，樣本數過少，在進行變數交叉分析時，容易出現格子內樣本數為 0 的情況，而發生「小樣本問題」(micronumerosity)，在估計上將容易發生估計值過大或過小的情況（陳陸輝，199：169）。另外，關於模型係數值詮釋方式，對數模型（或稱洛基模型）是非線性的模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要視其他變數是控制在哪個水準上而定，並說明其相對的依變數機率是多少，藉以評估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不同於一般線性迴歸模型對於迴歸係數的詮釋是，當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大小（盛杏媛，1998：48）。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

過去比較政治與比較政府的研究，通常指涉的是比較憲法或比較政府，其研究方法採取的是，以說明主要國家的政治制度發展歷程與現況，但也針對研究主體加以比較與

---

<sup>14</sup> 親民黨於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完後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乃宋楚瑜與張昭雄為延續總統大選競選團隊：「新台灣人服務團隊」的力量所成立，因本次選後面訪開始時間在七月執行，故直接以親民黨代替宋楚瑜、張昭雄之勢力。

討論。因多數民主化國家已經完成憲政，且實證主義已經成為政治科學研究不可忽視的一環，故比較政治亦逐漸走向經驗實證-描述研究(empirical-descriptive analysis)。比較政治指涉的意涵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針對不同政治制度、政治實體或機構等等運用比較方法加以描述，或利用實證資料加以比較說明。

李帕特(Arend Lijphart)指出比較政治研究方法中，具有科學性質(scientific methods)的方法主要有四：實驗法(experimental)與統計(statistical)、比較(comparative)與個案研究(case study)等三類非實驗法(nonexperimental)。而同時運用統計(stastical method, SM)與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 CM)則是比較政治研究方法中較好的選擇(Lijphart, 1971: 682-693)。

筆者利用比較方法、調查方法與統計方法，針對台灣與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比較，期望達成的目標有二：一為描述選民經驗到的政治現象及引發的行為，說明台灣與墨西哥選民在本次選舉中經驗的政治現況；其次是為建立一般性的原理或原則、藉以解釋與預測這些政治現象。

## 一、研究方法

### (一) 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主要是透過比較不同制度、組織、國家或文化進行比較分析，因此得以跳脫單一文化的束縛，又可以就體系層次的特點加以比較(Marsh and Stoker, 1995: 173)。但在進行比較分析研究時，可以選擇使用下列這兩種比較分析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所謂的「最大相似比較法」(most-similar-system-design)，亦即選擇相似度高的國家進行比較，這些國家間具有各種非常相似的特徵，如果發現這些國家有不一樣的特性或結果時，必須找出原因加以解釋。第二種方法為「最大相異比較法」(most-different-system-design)，

是選擇幾乎完全不同的國家來比較分析，這些國家的各種特徵差異甚大，當發現這些國家的相似點不是來自各國相異的特性，就可能來自其他原因。考量本研究的性質是投票行為的經驗研究，因此將利用最大相似法進行比較分析，二〇〇〇年台灣與墨西哥，同時由威權體制一黨獨大統治走向民主政體常見的政黨輪替統治，筆者期望從觀察、歸納與分析「為何台灣與墨西哥在相似的一黨威權統治政治環境下，選民都選擇走向政黨輪替？」

## （二）調查研究法

筆者希望找出造成臺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主因，當採取個體的研究取向，調查資料是最好的選擇，故筆者利用臺灣與墨西哥大型面訪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深入研究選民對本次選舉的認知、態度與行為，進而推論政黨輪替成因。

在比較經驗研究中使用調查資料，會遭遇兩難的問題，首先，是要仰賴別人蒐集的二手資料，還是自己去蒐集第一手資料。因為二手資料並不是研究者真正所需，若自行蒐集一手資料，能掌握的程度較高；其次，蒐集所得變數內容共量性，若自行蒐集，可以讓變數測量一致，若運用別人二手資料，馬上面臨無法確定每一個國家所分析的變數內容都相同；相反地，第一手資料也同樣會面臨相同變數運用相同工具測量，卻無法測到實際變異的情形。第三，使用二手資料的成本，相對於自行蒐集的第一手資料較為便宜，若進行一手資料蒐集，其成本非筆者所能負擔。

事實上，要蒐集不同文化國家的個體資料有其困難度。因此運用資料時，必須注意兩項問題：首先，必須確信名詞之間未具有語言落差，亦即翻譯要精確無誤，針對各國測量的問題必須相等，或甚至幾近相等的。第二，除語言與政治文化障礙外，政治文化因素也會影響人們對問題反應的方式。雖然跨國比較會發生不同測量等方法論或政治文化因素差異等侷限，但若筆者在運用調查資料進行推論時，能夠謹慎不做過度推論，依

然可以獲得豐富的成果。

## 二、研究個案的選擇

比較研究的成敗，案例的選擇經常影響研究設計與研究成果。研究個案的選擇關係到整個研究的成敗，在最好的情況下，研究者應該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如此就不會因文化差異而產生偏差，沒有選擇個案的問題了！但在實際研究中，受限於資料限制，可以獲得的選擇也將減少。如許多國家所公布的資訊極為有限、相當不精確且過時。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研究議題過於敏感，導致各國所提出的資料之間有明顯的落差，如定義不同因而無法比較。最後，則是跨國研究經費相當昂貴，所能獲得的資訊可能也相當有限。由此可知，在挑選某些特定國家進行研究時，必須更加謹慎界定比較的範圍，以減少可能發生的偏誤。

比較研究的成敗，案例的選擇經常影響研究設計與研究成果，本文為經驗政治的「個案研究」，本研究期望能達到社會科學研究所追求的「通則化」(generalization)目標，期盼透過經驗個案研究的積累，將有助理論建構(theoretical structuring)，甚至進行理論檢驗(theory testing)，期許對社會科學研究與發展有所貢獻。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總統選舉皆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都是由三股主要政治勢力或政黨捉對廝殺的局面，結果都由第一大反對黨獲勝的相似結局。本文選擇台灣與墨西哥的個案進行跨國比較研究，基於四個原因：首先，兩國都曾是一黨獨大的國家，台灣是國民黨，墨西哥則為革命建制黨；其次，皆長期處於威權體制之下，台灣國民黨已執政五十五年，墨西哥已執政七十一年；第三，則是總統選舉制度，同樣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第四，在民主化轉型後，同時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本文選擇台灣與墨西哥兩國，這兩個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個案」，未來將並有助於適當推論其他個案共通性。

### 三、資料及其限制

本論文礙於面訪調查資料在進行變數說明時的不足，為使本研究更行完整，在台灣方面，將使用四種資料進行佐證；在墨西哥方面，則使用媒體與學術機構在不同時間點執行的面訪調查及投票資料進行補充。以下是本文所使用資料的說明：

#### (一) 台灣資料

由於資料蒐集工具、資料蒐集期間、抽樣設計與問卷設計等方面的差異，因此進行資料結果推論時，難免會有一定的限制，但由於面訪資料蒐集不易，「政黨重組」這個變數必須是經過多次觀察所得的結果，在調查次數不夠的狀況下，為讓本論文的研究更為完整，必須藉助其他的調查資料進行說明，因此本論文分析所使用的資料，將包括四個部分：

- 1、投開票記錄：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共同開發之「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查詢系統」，作為總體資料長期變化的補充說明。
- 2、電話訪問調查資料：主要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行政院陸委會所委託，其餘則來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執行的其他研究計畫。這些電話訪問的母體是以台灣地區的合格選民為主，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母體，採取電話號碼尾數隨機方式，進行戶中取樣選擇受訪者，以進行電話訪問。上述所有電話訪問調查結果，將作為個體資料長期變化的補充說明。
- 3、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面訪調查資料：針對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使用長期面訪資料進行補充說明，主要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委託。以全台灣地區具有國籍、設有戶籍，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選舉權的公民，作為調查訪問之母體，採分層抽樣的原理，抽取出具有代表性的公民，利用面訪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 4、臺灣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面訪調查計畫：由黃秀端教授主持並由台灣大學選舉研究室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研究小組由台灣不同學校的教授共同規劃組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委託。研究對象是以全台灣地區具有國籍、設有戶籍，

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選舉權的公民，作為調查訪問之母體，採分層抽樣的原理，抽取出具有代表性的公民，利用面訪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本資料主要研究目的是，企圖瞭解三位候選人在激烈的選舉競爭中，為何主要反對黨陳水扁得以獲勝的理由，另外，本次選舉結果對現實政治以及未來國家走向有十足關鍵的影響，因此本次總統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更值得關注。討論的主題包括：政治預存傾向（政治信任、民主態度）、政黨態度（政黨認同、政黨形象）、候選人形象、議題立場、投票抉擇、投票或不投票原因等。本文主要使用的面訪資料是台灣大學「公元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選後全國性選民投票行為」面訪調查計畫，執行日期為二〇〇〇年六月三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共計完訪 1,409 個樣本。

## （二）墨西哥資料

使用這些資料時，由於資料蒐集的方式不同，期間長度不足，選舉類別不一，因此推論時具有一定侷限。「政黨重組」指涉經歷不同時間點，多次觀察所得的結果。為讓論文研究內容趨於完整，本論文分析使用之長期變化資料，除使用墨西哥聯邦選舉院 (Instituto Federal Electoral, IFE) 的投票記錄外，更輔以其他面訪調查資料進行補充，主要取自不同調查機構歷年所進行的研究計畫。因此本論文分析所使用的資料將包括三個部分：

- 1、墨西哥聯邦選舉院的投票記錄：由墨西哥聯邦選舉院所開發之歷屆總統、參議員與眾議員投票記錄，利用此投票記錄之次級資料作為長期變化資料的補充說明。
- 2、媒體調查資料：作為長期變化資料的補充說明，主要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墨西哥蓋洛普公司(Gallup Mexico)、培頓羅森諾通訊研究(Beldon Russonello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墨西哥自治技術學院(El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ITAM)及墨西哥與美國民主願景基金會

(Hewlett Mexican and US Vision of Democracy)所進行的面訪調查。

- 3、墨西哥二〇〇〇總統大選面訪調查資料：由多明葛茲(Jorge Dominguez)及羅森(Chappell Lawson)領銜，美國各大學研究墨西哥的專家及墨西哥政治學者共同規劃。<sup>15</sup>經費來自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及墨西哥報業媒體《改革報》(*Reforma*)共同贊助，研究對象是以全墨西哥具有國籍，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有選舉權的公民，作為調查訪問之母體。本資料呈現出革命建制黨面對反對黨十分激烈的挑戰，以及在激烈競爭下，選民投票抉擇所衍生出的結果。討論的主題包括：候選人議題位置與形象特質、選民對候選人之情感溫度、負面競選、政策議題及立場，以及反對黨支持者的策略投票等等。從資料分析所得的部分證據顯示，眾多因素在選民投票抉擇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所使用的是墨西哥總統選舉調查計畫中的第四波調查，為選舉結束後的全國性面訪調查，執行日期為二〇〇〇年七月七日至七月十六日，計完訪 1,199 個樣本。
- 4、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面訪資料取得，主要來自於筆者二〇〇三年三月至八月獲得教育部補助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美國與墨西哥研究中心(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進行短期訪問研究及資料蒐集工作，該中心主任及政治系教授柯尼爾茲(Wayne A. Cornelius)，正好是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選後面訪調查計畫共同主持人，慷慨允許作者使用本計畫之相關調查資料。另一方面，則透過該中心研究人員且為該校政治系博士班學生艾斯特拉達(Luis Eisenstadt)的協助下，獲得本文相關的重要調查資料。<sup>16</sup>

---

<sup>15</sup> 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固定樣本長期觀察計畫(Mexico 2000 Panel Study)參與研究人員包括 Jorge Domínguez, Chappell Lawson, Roderic Camp, Wayne Cornelius, Joseph Klesner, Beatriz Magaloni, James McCann, Alejandro Moreno, Federico Estevez, Alejandro Poiré, Miguel Basañez, Pablo Parás, and Kathleen Bruhn。

<sup>16</sup> 艾斯特拉達在修習政治學博士班課程之前，在墨西哥民意調查機構上班，擁有相當豐富的調查資料，當作者遇到問題時，例如：問卷翻譯及重要議題時，都是透過電子郵件與該員聯繫。

#### 四、主要變數的測量

本文嘗試釐清影響二〇〇〇年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主因，在操作變數上，就使用「政黨抉擇」這個變數當作依變項，因為選舉結果已經揭曉，我們在變數操作上，將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或國家行動黨總統候選人者，都當作是選擇政黨輪替。選民的「政黨重組」、「候選人評價」與「經濟評價議題」及「改革議題」為自變數，試圖以上述變數與概念來分析，並解釋造成台灣與墨西哥兩國選民在總統大選後的政黨輪替。主要變數有三，一為「政黨重組」的概念，在操作上則利用選民的政黨認同進行分析，投入模型分析的是經過政黨重組之後選民的政黨認同；二為「短期因素」的概念，在操作上乃是利用選民的候選人評價進行分析，投入模型分析的是選民心目中的最佳候選人評價；三則為「經濟評價議題」的概念，在操作上利用選民心目中的經濟評價，投入模型分析的是選民的經濟問題重要性、經濟回顧與經濟展望。台、墨兩國在問卷設計上有些許不同，試以政黨認同為例說明：

政黨認同的測量主要來自於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的二元面向測量，當二元面向轉為多元面向測量時，在分析的層次上就會產生明顯的爭議，政黨認同的概念也會擴張成多元面向，因此在台灣與墨西哥都面臨政黨認同 (party identification)、黨性 (partisanship)、政黨偏好 (party preference)、政黨支持 (party support) 等名稱之間經常交互使用的情況。<sup>17</sup> 政黨認同相關概念內涵雖有差異，但一般說來，普遍都承認是一個對投票行為有影響的變項。政黨認同在台灣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當台灣政黨體系經過

---

<sup>17</sup> 政黨認同如何界定及如何測量，學者之間的意見相當分歧。在《美國選民》一書中主要是依據 reference group theory 界定，將政黨認同指涉為選民在心理上對特定政黨的認同，不一定是組織上或行動上和特定政黨發生關連，在測量上通常使用「我是民主黨人或我是共和黨人」(I am a Democrat or I am a Republican) 的方式，這種問法若在台灣使用會產生明顯易見的誤解，因為若直接問選民是國民黨人、民進黨人、親民黨人並不會讓選民聯想到是在問心理認同，反而會讓選民誤以為是在詢問黨籍 (劉義周, 1987)。在台灣，無論是台灣大學選舉行為研究小組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都受到密西根學派的影響，且兩個學校運用政黨認同概念的方式，大同小異。台灣大學問卷是詢問受訪者：「在國民黨、民進黨和親民黨之中，您比較偏愛哪一個政黨？政治大學的問法則是詢問受訪者：「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支持民進黨的、支持親民黨的還是支持其他的政黨？」這兩種詢問方式都符合 Miller and Shanks(1996: 117-150) 所言之黨性與政黨偏愛，為了便於操作起見，本文在討論時並未嚴格區分這些概念。



不斷的重組，政黨認同的問題不時引起爭議。因為政黨體系的重組，會讓民眾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變化，甚至導致執政黨內部分化，讓反對黨有機可趁，導致政黨輪替的結果。

### (一) 台灣

「目前國內有四個常聽到的政黨，分別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請問國內這幾個主要政黨，各有各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黨的支持者？（若都不是政黨支持者續問）請問您通常站在哪一邊？」

運用上述兩題建構國民黨、民進黨與親民黨三個主要政黨的政黨認同或政黨支持者（或站在哪一邊）的變數，回答其他政黨與不知道者則歸類為無反應。

利用瞭解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在模型分析時，則運用對數的概念，重新歸類為支持國民黨對抗非支持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對抗非民進黨、支持親民黨對抗非支持親民黨，等方式瞭解選民支持對象對政黨輪替的影響力

### (二) 墨西哥

墨西哥問卷的政黨認同題目西班牙文版原文如下：

49. Generalmente, ¿usted se considera priísta, panista o perredista?

中文翻譯：「一般而言，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革命建制黨支持者，國家行動黨支持者還是民主革命黨支持者？」

（回答明確認同政黨者則續問50題；若回答「都沒有」或「不知道」者跳問51題）

50. ¿Se considera usted como muy... (PRIISTA / PANISTA / PERREDISTA) o algo... (PRIISTA / PANISTA / PERREDISTA)?

中文翻譯：「請問您支持這一個政黨的度？」（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還是民主革命黨）？

50ª. ¿SOLO A QUIENES DIJER ON “NINGUNO” O “NO SABE” EN PREGUNTA 49?

中文翻譯：「請問對第49題所回答的政黨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

51. ¿Por cuál partido se inclina usted más? (NO LEER)

中文翻譯：「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

運用上述三題建構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三個主要政黨的政黨認同或偏向哪一黨的變數，回答其他政黨與不知道者則歸類為無反應。

運用政黨認同變數瞭解墨西哥民眾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在模型分析時，則運用對數的概念，重新歸類為支持革命建制黨對抗非支持革命建制黨、支持國家行動黨對抗非國家行動黨、支持民主革命黨對抗非支持民主革命黨，等方式瞭解選民支持對象對政黨輪替的影響力。

## 五、研究假設

從以上對相關背景描述中，吾人可以合理地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與說明。首先，從報章雜誌及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資料中可以看出，自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八年，在台灣，國民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十七，民進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六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新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三上升到百分之六。在長期趨勢來看，民進黨於一九八六年成立囊括多數反國民黨的力量，新黨從國民黨分裂而出新國民黨連線，並於於一九九三年正式成立。由各政黨得票率分佈的長期趨勢來看，政黨重組的現象似乎已在台灣選民發生。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九七年，革命建制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六十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而政黨認同為國家行動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八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六，民主革命黨認同者的比例，從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八下降到百分之六，不同政黨得票率的分佈變化，讓政黨重組的現象逐漸從墨西哥選民發軔。

當台灣與墨西哥發生政黨重組，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改變，執政黨認同者的支持度逐漸降低，反對黨支持度持續升高，形成所謂的交叉點，當選民在總統選舉時，依照

重組後的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時，反對黨就可能擊敗執政黨取得執政權，進而導致政黨輪替。在台灣，發生政黨重組後，原本執政的國民黨失去多數，由反對黨民進黨取得相對多數並完成政黨輪替；在墨西哥，發生政黨重組後，原本執政的革命建制黨失去多數，讓反對黨國家行動黨獲得相對多數並完成政黨輪替。因此筆者假設命題一如下：

**假設命題一：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在政黨重組發生後，選民投票給在野黨總統候選人的比例明顯增加時，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其次，在台灣，來自於執政黨背景的總統候選人連戰與獨立候選人宋楚瑜在處理政治事務或國際事務時經驗俱佳，出身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能否改變現有的經濟劣勢則仍有疑義。相對於連戰與宋楚瑜，在野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的候選人評價相對較佳，尤其台北市長任內的執行力、改革能力與對抗黑金政治能力得以凸顯。故陳水扁在候選人評價上（人格特質、能力與選民對候選人之感覺溫度）領先連戰與宋楚瑜，獨居領先地位的機率相當高。

在墨西哥，來自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拉巴斯迪達(Labastida)與具有執政黨背景的民主革命黨總統候選人卡德納斯，在人格特質與處理事情的能力上經驗頗佳。但相對於拉巴斯迪達與卡德納斯，在野黨候選人福克斯的候選人評價相對最佳，其清新的形象與州長任內行政能力、改革企圖與決心充分展現。因此福克斯在候選人評價上，領先拉巴斯迪達與卡德納斯的比例相當明顯。

選民在選舉時，會依照其對候選人的評價來決定其投票意向，當選民給予在野黨候選人最高評價時，投票給在野黨候選人的機會就明顯增加，進而發生政黨輪替的現象。在台灣與墨西哥，選民對原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的評價偏低，或明顯低於在野黨總統候選人時，選民會支持在野黨總統候選人，提高成功政黨輪替的機會。筆者假設命題二如下：

假設命題二：當選民對在野黨總統候選人評價明顯高於執政黨總統候選人，選民投票給在野黨候選人的比例會明顯增加時，造成政黨輪替的機會也明顯提高。

第三，台灣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發生重大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衝擊台灣的經濟發展，甚至導致國家經濟負成長的局面，讓許多過去對國民黨最擅長處理經濟的認知發生改變，二〇〇〇年時，當選民回想過去一、兩年經濟表現，而對現況進行比較，表示不滿意者，就有可能轉而支持在野黨；相反地，因為選民對國民黨的經濟處理能力已經完全失望，在這種不滿情緒下，選民轉而期望新的執政者能改變經濟惡劣的現狀，故選民支持在野黨的機率就大增。墨西哥在一九八二年發生外債危機，過度仰賴石油經濟的情況下，外債高居不下，嚴重侵害墨西哥的經濟成長。一九九四年因為披索大量貶值的結果嚴重影響墨西哥的競爭力，讓墨西哥民眾會回溯過去一、二年或甚至更久的經濟表現時，都可能表示不滿意的意見。這種重大議題評價主要以經濟表現評價為主，包括負面經濟回顧評價與正面經濟展望，研究經濟因素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最初假設是：「當經濟惡化時，執政黨下台」。這個假設是以回顧評價投票的方式決定投票對象，選民是根據具體事實作為投票依據，易言之，執政黨過去的施政表現就會成為投票時重要的參考依據；相反地，正向經濟展望則是根據執政黨或其餘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承諾來投票，也就是選民會以未來的經濟表現當作投票抉擇的基礎，甚至可以說當選民認為當前經濟景氣不佳時，選民會有傾向改變當前環境的動機。在本次選舉中，有部分選民是根據執政黨的施政成績或期望在野黨未來政見承諾來投票。這兩類選民的多寡，會影響該次選舉的特性，相對影響政黨輪替的機會（劉義周，2005：148-151）。

經濟評價投票除了依照選舉投票時序先後劃分之外，另外也從考量的經濟層面是總體抑或個體而區分為社會經濟評價投票與荷包評價投票。社會經濟評價投票的假設為選民對國家社會整體經濟情況的認知，是主導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意即選民認為經濟持續繁榮時，就會支持執政黨；相反地，當選民認為經濟日益惡化時，就會用選票唾

棄執政黨，轉投給在野黨。另外，荷包評價投票的假設是，選民對個人或家庭的經濟狀況評估，作為投票抉擇的關鍵因子，若選民認為自己或家庭的經濟狀況有改善，將會偏向投票支持執政黨；相反地，若選民認為自己或家庭的經濟狀況並未改善，則會偏向投票支持在野黨。

在台灣與墨西哥，議題評價主要以經濟評價為主，使用的題目結合時間性與不同經濟層面。在台灣，詢問選民的題目是總體經濟回顧評價與總體經濟展望評價，而在墨西哥，詢問選民的題目則為總體經濟回顧評價與個體回顧評價投票。我們將分別利用台灣與墨西哥的經濟評價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力進行分析，並討論經濟評價對政黨輪替的影響。因此筆者假設命題三如下：

**假設命題三：當選民對經濟回顧給予負面評價升高或對經濟展望給正面評價升高，使過去經常支持執政黨的選民，會轉而選擇主要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這種「換人做做看」的民意讓政黨輪替的機會明顯提高。**

本文將利用上述的研究假設探討政黨重組、短期因素、經濟評價與重大議題評價與政黨輪替之間的關係，亦即選舉結果幡然易幟是否與上述三個變數有關，本文關心的是造成中央層級的政黨輪替的影響變數，也就是達到杭廷頓所言民主鞏固重要指標中二次政黨輪替的首次政黨輪替。

筆者第二章將說明，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武關係及國際關係等民主化的問題？其中，台灣與墨西哥所面臨的問題各為何？台、墨兩國之間的同與異為何？第三章討論政黨重組如何影響台灣與墨西哥發生政黨輪替？第四章討論候選人這個短期因素如何造成台灣與墨西哥發生政黨輪替？第五章將討論經濟評價議題或其他重大議題如何影響台灣與墨西哥的政黨輪替？第六章將會控

制人口變項，利用政黨重組、候選人短期因素、重大議題等當作自變數，政黨抉擇為依變數，在控制人口變項之後，分析不同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力。第七章則針對研究成果進行總結。